

新中国文革时期科技知识分子在 “革命”语境中的价值选择 ——基于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的考察

侯强

内容提要: 在文革时期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激荡下, 整个中国实际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以致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带来了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发生, 最终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文革这场反文化、反文明和反现代化的政治运动中, 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的困惑和选择同时表明了是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 他们的价值选择中实际包蕴了丰富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 文革时期; 中国科学院; 科技知识分子

作者介绍: 侯强(1966-), 男, 江苏句容人, 江苏理工学院教授,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邮箱: houqiang@jsut.edu.cn

Title: Value choices made, under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Base on a study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China descended into a state of utter chaos during the political upheaval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caused a decline in the intellectuals' social status, with many suffering tragic fates. More importantly and inevitably, this has hug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advancement. During this traumatic period of anti-cultural, anti-civilization and anti-modernization, the confusions faced and choices made by the intellectual provide a vital insight into the dire situation of that time. How the intellectuals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sets of values in fact contain profound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peculiarities of that period.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echnological Intellectual.

Author: Hou Qiang (1966-), born in Jiangsu. He is a Professor at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 gained his PhD in History, mainly focu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study. Email: <houqiang@jsut.edu.cn>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但不可否认，其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一些因极左政治的肆意横行带来的曲折教训。其中，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开始于 1966 年，结束于 1976 年，简称之为“文革”），就把“左”的错误推到了极端，给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国家以及领导下的人民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伤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谓。作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大革命”，其之所以被冠之以“文化”之名，是因为它最初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初衷虽是出于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实际演化为破坏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是一场反文化、反文明和反现代化的政治运动。对此，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在文革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激荡下，整个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而科技和教育战线则被公认为是文革的“重灾区”，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限制和排斥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制度。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为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的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的综合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之初，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迅速凝聚了一批海内外优秀科学家，组建了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其在“向

科学进军”中发挥了先导和主力军的作用。但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作为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被视为一个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单位，受到了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是时，包括上自副院长吴有训下到各普通研究员、副研究员，几乎是无人幸免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以致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笔者看来，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实处境中的价值选择，折射出了政治的动荡和理性的吊诡。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透视新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机制，认识隐含于其中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极左路线导致的民族灾难，从而更深刻地总结文革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教训。而对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的研究，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

中外学术界虽对文革历史多有研究（最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界，中国大陆有关文革的研究虽从未间断过，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对文革历史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但大多为文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如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口述史、回忆录，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资料性文章，带有史料整理或史实考证性质的学术文章）以及从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综合视角进行的地方性个案研究、宏观性和专题性研究，对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的微观进行较为集中的专题研究成果还鲜见。据笔者所见，中国国内大陆学界涉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专题研究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1989年，作为《当代中国丛书》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印出了预印本，叙述了中国科学院40年的发展史。1992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科技战线五十年》，武衡根据其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表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50年的科学技术工作。2009年，《中国科学院六十年》编辑部印出了《中国科学院六十年（1949-2009）》，以图为主叙述了中国科学院60年发展史。这些研究成果虽都对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问题有一定篇幅的阐释，但还都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的考察，对其在是时现实处境中的价值选择作些思考与分析，借以反思特定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信仰、价值和精神追求。

二、科技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党基本延续了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思想灌输和思想改造运动，采取了边改造、边使用的政策。但随着此后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和科学政治化的出现，科技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社会地位持续下降，及至文革期间达到了极致。是时，专业技术的重视被政治信仰的强调所取代，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极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科技知识分子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党的干部受到赞扬，认为他们强于西方方式和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对比之下，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受到诽谤”，¹逐渐被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学术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自由。

文革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认为科技领域的领导权已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要求全党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科学技术发展因之被纳入了“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轨道。然而，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而是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所谓的“大破大立”，这就使得各级科研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以致上演了一幕幕不堪回首的闹剧和悲剧。是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喧嚣声中，不仅知识的权威被否定，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且知识分子还被武断地划归到资产阶级范畴成为专政的对象，因之受到无端的排挤和打击，甚至被迫害致死。

文革作为新中国建立之初 17 年体制的产物，因其以简单的方式套用了以往革命年代的经验 and 做法，显得特别的狂暴，结果以更极端的“左”摧毁了 17 年体制，把阶级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具

1 [美] J.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97-398。

有使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力量，凡是阻碍它发展的，都会被它无情地消灭。它发动的范围越广，形成的生存压力越大，社会动乱的程度就越深。”²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文革期间，因对一切技术工作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对待和分析，使得“左”的思潮迅速泛滥起来，不仅造成了打倒一切的局面，而且也带来了一切被打倒的局面。

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左”倾错误不断积蓄起来的巨大政治能量最终被猛烈地释放出来，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漩涡，造成了全国性的全面动乱，把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对科技文化的危害推到了极端。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³是时，科技领域陷于接受“再教育”和被改造政治漩涡中的专家、学者们，其中许多人因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倍受摧残，随之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所应有的环境和条件，以致在呼啸而来的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中，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无尽的迷惘、惶惑、痛苦和绝望之中，只能在逆境中寻求发展。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驱动下，“文化大革命”热衷于用政治批判代替科学批判，粗暴地打击和鄙薄知识分子。是时，在科技领域内，文革把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的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以致“文化大革命”实际已演变成了大革文化的命和大革科学的命。在政治统摄一切的情境下，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规定，深入揭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观点”，实现无产阶级占领科学阵地，竟荒唐地把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当作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并将爱因斯坦看作是“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此，全国上下吹响了无产阶级科学技术大革命的号角，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的科学批判组织，编印了一大堆所谓科学批判材料，炮制了一系列对科学

2 朱乔森、李玲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3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390页。

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斗倒、批臭了一大批持不同学术见解的科技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科技战线因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重要领域，许多科研机构或被撤消或被迫停止工作，整个科研系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除个别领域外，主要是军工方面），各项科学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而被砸烂、抛弃。是时，规划和管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因被攻击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班底”在1970年被撤消，转由国务院教科组代行职责。全国科技界权威性的群众性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历经大冲击和大动荡后，于1968年实行军管。翌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全部干部又被集体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以致其已名存实亡，及至1970年才部分恢复工作。

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其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作出了“两个估计”，认为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否定了建国以来17年党的教育工作。事实上，“两个估计”基本是1966年“五七指示”的文件化，因之具有统帅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冲击力。就其影响而言，“两个估计”已不单纯是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出了错误的政治评价，其实际隐含着对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不信任的基本评价，并已成为文革时期强加于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标志着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彻底丧失。

是时，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律被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技术第一”，使得原本就很狭小的对外科技交流渠道变得愈加狭小，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对外科技交流工作。在文革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极左势力肆意挥舞政治大棒，污蔑党内健康力量“反对宪法中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科研方向，就是要使科研回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就是要使科技战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⁴这一切不仅

4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大批判组：《不许扭转社会主义科研方向》，《人民日报》，1976年6月20日。

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弄得整个科技界人心惶惶，使得中国科技的很多研究领域在此期间几乎陷于停顿，与世界先进国家整体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对此，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⁵ 诚哉斯言。

三、中科院科技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党因长期为“左”的思想所困扰，实际已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认识的误区而又无以自拔。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言，因党和政府未能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信任和尊重，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知识分子的“改造”因之被推到了极端，以致变成了打击和迫害，最终导致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发生。是时，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推进中受尽种种折磨，在社会的夹缝里顽强地生存，经历了难以名状的不安与惶恐，灵与肉的折磨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时代印痕。这在科技知识分子扎堆的中国科学院有着较为典型的反映。

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与中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其无疑起着“火车头”的重要作用。有资料显示⁶，发展至1965年，中国科学院已拥有106个研究所，职工6.03万人（其中科研人员2.19万人），基本形成了学科齐全的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但文革爆发伊始，中国科学院即屡遭冲击，其研究机构被大量削减和下放，到1973年仅剩下53个研究所（含双重领导的单位），职工3.52万人（其中科研人员1.35万人），学科残缺不全，研究力量薄弱，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的整体性质和任务，以致众多科学研究工作被迫停顿或延缓，使得广大科技知识分子陷于空前的困顿之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5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6 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20-21页。

文革爆发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反科学潜流得以恶性发展起来，不断猛烈地冲击着正常的科技秩序。是时，中国科学院被视为长期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单位而遭到攻击和诋毁，是一些人眼中应该被打碎和砸烂的机构。1966年7月30日，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发生，陈伯达和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召集科技界的万人大会，煽动中国科学院的群众揪斗“走资派”，中国科学院很快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历史地卷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浪潮。1967年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闻风而动，成立“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院联夺”），夺取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权，迫使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委停止活动靠边站，正常的科学技术研究秩序因之被打乱。当日，中国科学院学部被宣布撤消学部的一切活动被迫停止，罪名是所谓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

随之而来的是，分布于中国各地各部门的绝大多数学部委员因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了批斗，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同年7月30日，“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实行解放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是时，虽然“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名义上是郭沫若，但实际上许多造反派头头挤进了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并把持了革委会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大权。及至1968年9月20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中央的命令进驻中国科学院，开始了工人和军人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特殊时期。

对于十年动乱的危害，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一种整肃，那么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包含了一种更为严重的反科学运动。”⁷事实也是如此。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便专门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自然科学理论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进行了无原则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肆意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自然科学中的学术问题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将自然

7 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科学领域内的学术观点的分歧错误地看作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引发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矛盾的发生，以致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被极左政治无情地撕裂，一些日常科学研究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

是时，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被强加了许多罪名，成为专政的对象，横遭批判与迫害。有资料显示⁸，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科学院包括副院长吴有训在内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几乎无一幸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以1968年为例，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布所谓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以致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立案审查，遭到非法监禁、残酷折磨和刑讯逼供。该年，仅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名高研中就有131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的对象。在十年动乱中，中国科学院被抄家的有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有229名，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占全院职工总人数的0.38%。尤其严重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占分院职工总人数的比例高达0.68%。除上海分院外，长春分院的长春光机所、应化所以及在沈阳、大连、青岛、福州、武汉等地研究机构中的许多科技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刑讯逼供。这些不仅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而且也是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悲剧。

1969年，当“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斗、批、改”中的“改”字阶段时，在“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借口下，中国科学院各大区分院被撤销，大部分科研单位都被下放给了地方，许多科学技术研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缺乏设备及物资而陷于瘫痪。与之同时，大批“有问题”的干部和科技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学校”，不得不放弃原来所学的专业或从事的工作，接受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再教育，不仅白白耗费了他们的科学年华，而且造成了他们难以名状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⁹以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为例，其“学员”人数常年大约有1000人，最高峰时曾达到2400人。由于其地处沼泽地带，位于湖北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高发区，先后有100多名“学员”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其中，有人还因没有彻底治愈后来导致肝硬化的发生，最

8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预印本），北京：中国科学院，1989年，第73-74页。

9 广大干部和科技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学校”进行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的场所是强制性的，凡不服从单位安排的下放人员，一律扣发工资。

终离开了人世。¹⁰ 1969年，在林彪签发“一号命令”后，中国科技大学奉命迁到安徽，在搬迁过程中不仅所有仪器设备全部报废，教职工也散失了三分之一，而且从此依靠院、所办学的优势不复存在。

文革时期，由于大批科研机构被拆散，不仅研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而且国内外日常的学术交流也随之中断。是时，中国科学院各所与国外的联系不是极少就是完全停止。与之同时，国内不仅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期刊都停刊了，而且基础科学研究也基本被否定。加之，凡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要受到审查和批判，迫使众多科学家不得不中断了与海外的联系，以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实际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状态之中。

文革爆发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经费也大为削减，科研物质保障条件趋于严重的恶化状态。据统计，1967年的经费只占1965年的16%。1970年以后经费虽略有增加，但1976年的经费仍比1965年减少1/3以上。¹¹ 是时，中国科学院的科研设备及实验室也遭受严重破坏。以北京植物园为例，其在被扣上了搞“花花草草”和“封、资、修”的罪名后，于1970年被撤消，变成了为中央首长供应副食品的基地，除了种菜外，还养鸡和猪。这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逻辑。在撤消后的搬运中，北京植物园多年搜集和培育的种子、标本以及拥有的图书资料损失严重。及至1972年，中国科学院虽然最终作出了恢复北京植物园的决定，但其被撤消所造成的损失是一时怎么也难以挽回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险恶情势下，周恩来、邓小平和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乱云飞渡仍从容”，他们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穿过政治风云的硝烟，关心和支持科学工作，采取把“焦点问题”模糊化的策略，在左躲右闪中尽可能与极左政治带来的负资产“切割”，极力寻找实现“革命”与建设的有效平衡点，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以尽力保护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减少政治运动对科技事业发展所造成的损失。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些意图化危机为转机的纠“左”措施，虽仍然被极左政治所裹挟还有些笼统和含混，都还只

10 薛攀泉：《科苑前尘往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11 张化：《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能是做到“点到即止”，且大多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但其也犹如一大块抛向政治生活中沉浮的木板，尽可能使一些人拽着它上了岸。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正是在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关怀和保护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中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通力合作，才得以在1974年完成了分辨率为1.8埃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分析。对于深处“漩涡”中的中国来说，这一研究成果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其表明中国生物大分子的晶体结构分析工作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是时，在“科研为战备服务”的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军事科研实行了保护政策，使得中科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并入军事科研体制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而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在文革中，中科院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卫星研制工作中的研究力量和设备交给了七机部，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四、中科院科技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虽然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偏差，但这些问题是局部的，偶有冲突也都在正常范围，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较为成功的。可以说，一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前，党和政府都比较重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尤其是发挥科技知识分子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的作用，使他们蕴蓄已久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了出来。但反右运动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广大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彷徨和不知所措之中。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机构能够不受损害地逃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¹²。对此，面对政治与现实的矛盾和折磨，身陷“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感触尤深。¹³

12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1页。

13 早在“十二年规划”实施期间，党中央就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文革时期，伴随着波浪式政治运动的向前推进，党和政府把意识形态中“左”的错误和危害推到了极端，改变了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看法、态度与政策，开始错误地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灭顶之灾。由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了“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仅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人民政府的供给，而且在人生追求和精神追求方面也不得不唯政府是瞻。如此，面对文革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已变成“单位人”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是时，对中科院科技知识分子来说，因为现实的政治压力过大，加之严密的单位制度的束缚，以致个人在社会中没有任何出路，所以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生存”已成为第一要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疲惫与茫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虽被极左政治逼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屈从于所有强加于他们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但仍想尽办法以谋求社会的认同，成为文革时期苦难中的一群求生者。可以说，这既来自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也来自知识分子对现实处境无奈后的自救。

以杨嘉墀为例，1969年，作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主要研制和发射的科学家之一，他被“靠边站”到了自动化研究所去当厨子。半年后，他又被“站”到了北京假肢厂，去专为在礼花生产中因抢救国家财产而失去右臂和左手的王世芬研制假肢。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之下，为了生存的需要，他对于这些工作都用心地去做了。他做的饭，科学家们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研制的假肢不仅用在王世芬身上，还走出国门远销到了海外。在那样一个“物质暴力”和“心理暴力”双重控制下的“天翻地覆”时代，对于一个没有忘记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杨嘉墀的行为是身不由己，也是身不由己背后的抗争与妥协，呈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可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里对科学研究尚存有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这一选择虽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但反映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生存困境、尴尬地位以及其内心的那份无力、无奈和迫不得已。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研究工作的失去，那种来自内在力量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

再以华罗庚为例，在现实政治语境的挤压之下，其虽被卷进了无法抵御的文革政治风暴中，弄得筋疲力竭，但他凭着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科学一直保持着圣徒般的敬重和殉道者的精神，并没有因之而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而是继续演绎着作为知识

分子的担当。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出于来自内心的渴望和梦想以及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信心、责任和热爱，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从胶水般的现实中奋力一跃，在自己的领域中竭尽所能，克服重重困难，力所能及地大力推广和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极端强调“阶级”和“阶级立场”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虽然从一开始就成为专政的对象，被卷进了一场无法抵御的政治风暴之中，如惊弓之鸟般始终未能从极其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即便如此，中科院广大知识分子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极力找寻政治动荡年代的某种安顿，努力从自我价值的绝境中突围，并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展现了人类珍贵的良知和智识品质。可以说，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生态下，推广和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是命运对华罗庚他们的抚慰，也是留给他们意外的谋生手段。

侯德榜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作为闻名世界的制碱专家的他被无情地停职靠边站了。但这并不能遏制住他对学术的无限渴望，当他获悉一位青年邻居在“轰轰烈烈”的气氛中竟然有学习英语的愿望时，便制订教学计划，为他单独授课。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但他仍然一丝不苟。据说，一次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上门看他，他正在上课，竟也坚持上完课才与老朋友见面。及至1971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他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但当他得知中国要进口13套大型化工设备时，还是忧国忧民地勇敢地站出来，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进口一两套设备即可，或者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和技术软件，其他可以复制，一下进口这么多不合适。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事实上，这不仅是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突破自我的潜在动力和心理趋向，也是他们集体吟诵的心中的最高信念，并历史地成为他们性格乃至命运最重要的一部分。究其根源，其动力应该源自他们内心深处的强烈责任感。可以说，在那个反智潮流盛行的年代，中科院广大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代表一群人，而是代表一种力量，折射出的是他们坚守中的迷途和迷途中的坚守。

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新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科学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一个有理想的群体。可以说，所有的磨难都敌不过他们对真理追求的执着。在极左政治语境下，中科院一些知识分子虽背负着现实的政治压力，“品尝”着不确定的命运甚至是

以悲苦为主调的滋味，以致如此错位地身陷历史迷阵之中，但他们不甘于在政治运动中消磨和损耗自己的生命，在困境与困惑中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在极端困难的科研条件下，以一颗无怨无悔的心追求科学真理，期待着冰消雪融那一天的到来，极尽所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时，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选择，不是少数，而是主流，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科学研究中，对科学的执着已然变成一种激励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之中。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得失是微不足道的，相信科学的春天总会到来。这些在使我们感知到知识分子一颗颗热烈的心跳动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个时代里流淌着知识分子的一腔报国情。

令人不堪回首的是，伴随着文革政治风云的变幻，知识分子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无一不被裹进极左政治的历史漩涡中，普遍经历了跌宕起伏的非常命运。其中，中科院一些知识分子在避之不及的政治洪流中，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悲怆和绝望之中。他们中的“脆弱者”，虽竭力想把自己从滔滔洪水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来，但最终还是不幸被激流狂涛打懵、击倒，以致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被践踏得不能再践踏的尊严。以张宗燧为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红卫兵便莫名其妙地把他揪了出来，对其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更令他伤心欲绝的是多年积累起来的研究笔记，也在抄家中被抄走而遗失。在遭受百般凌辱批斗后，一个曾极为自信的学者，就此堕入了极度的失望之中，最后竟于1969年底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痛楚地自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他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永远的不理解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逃避方式的选择，无疑饱蘸着他内心无比的悲愤，而这些悲愤则是他与时代发生“错位”的结果，至于后人是怎么也无法体察其彼时的精神苦闷和心理变动的。令人扼腕的是，张宗燧的选择并不是那个年代孤单的样本。对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有研究者指出，其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以致反右运动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的大量自杀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¹⁴究其缘由是，一些遭受迫害折磨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这样一个让他

14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们绝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虽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但终因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多体味到的只能是内在的焦虑、紧张和矛盾以及深深的无奈和悲凉，除了选择自杀这种特殊的抗争外，已感到没有其他路可走。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法体味这些已冻结在历史苦难深处的他们内心所不为人知的压力和心境的。

有研究指出，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¹⁵这一见解符合“问题复杂”的取向，无疑是有一定深度的。文革时期，对极左路线的怀疑深深地敲击着知识分子的内心，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的困惑和选择同时表明了是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们的价值选择中实际包蕴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是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由于一味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科学，政治和行政对科学研究干预过深，对知识分子缺乏应保持的敬意，最终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就从深层制约了中国科技及其文化的发展，以致在科技运行机制和科技发展战略上弊患丛生、难以为继，造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自我断裂。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国家保持强大的支撑力量，并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文革时期，在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中，知识分子的困境及其表现，既使我们看到了极左政治环境是如何扭曲人性，也使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极左政治环境中的不时闪光。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大批判组：《不许扭转社会主义科研方向》，人民日报，1976年6月20号。

15 谢詠：《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4. 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5. 谢泳：《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7. 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8. 张化：〈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9.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预印本），北京：中国科学院，1989。
10. 朱乔森，李玲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11. J.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